

首届世界儒商文学研讨会论著之一

儒商文学论稿

潘 亚 曦

李氏基金会赞助

中国暨南大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心出版

我为儒商文学鼓与呼（代序）

多年前，笔者曾就东南亚华文文坛实际，提出“文学四化”（即“严肃文学通俗化，通俗文学健康化；现实主义现代化，现代主义务实化”）和十六字方针（即“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颂扬大小老板们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出钱出力，于80年代中挥毫上阵，驰骋华文文坛之壮举之盛况，受到海内外的首肯与好评。随后我又撰写题为《三军并起，光我中华》的论文，为“商军”的崛起鼓与呼。商军经多年努力，硕果累累，成为一支华文文学劲旅，令人叹为观止。为了繁荣华文文学，我又自铸新闻，称之为“儒商文学”，并计划明夏召开国际研讨会，深入研讨之。为此，先写此短文，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儒，乃春秋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派。儒家主张礼治，强调性善与伦理，崇德报本。儒家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人文精神，其内涵为道德伦常，归结到良心主宰。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入世的，强调“谋事在人”，即“事在人为”，“尽人事以安天命”。儒家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生在世当“为开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综观儒家典籍就不难发现，儒家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主流，是有其自身价值的。自然，儒学也有其局限性，有不合时代潮流的丑陋的一面，我们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许多人看来，商场是充满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乌烟瘴气场合，与氤氲着儒雅之气的文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所。

商人与文人（旧时称士大夫）属冰炭不相容的两类人。郭洙镇先生为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基金委员会出版的《双福文丛》所作的序言中说：“文学作品在我国缺乏商品的价值，所以，许多具有文学天赋能力的人，都在严酷的现实压力之下，放下了文学，转到更能牟利的行业去了。最后，乘下了一群对社会人群和时代负有重大使命的人，或者一批对文学十分热爱的‘发烧友’，他们才能排除了物质的诱惑，在寂寞而艰苦的文艺道路上顽强地奋斗下去。”这话说得当然有一定道理，然而，窃以为郭先生的序指涉的只是一个方面的现象，事物还有另外一面哩。

近十多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坛有一支商人与文人合二而一的创作队伍在文坛崛起（笔者称其为商军），他们闯出了一条“商文并举”的成功之路。马华的云里风、韦晕、慧适、庄延波、曾沛、郑宪文等，新华的黄孟文、骆明、周颖南、流军、陈剑等；菲华的林健民、郭健寅、陈恩、吴彦进、张灿昭、叶来城等；泰华的司马攻、梦莉、征夫、姚宗伟、方恩若、李栩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并多成为文坛翘楚或领导人。这些在商场和文坛双双喜获硕果的成功者，首创了一种“儒商文学”。东南亚华文坛涌现的这一些文学新品种，以及它的作者群，是一种引人注目、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商军的阵容颇大，其成员忠诚文学事业，在商场有“才子”、“才女”之誉，被称为“双才（财）”作家，其实他们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并不多。不少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打下国学根柢，后来迫于生活中途辍学。他们大都是敦厚良善，气质高远的人，有儒家风范，他们的作品便是人格的写照与延伸。但是，他们又与那种抱残守阙的国粹人物和四肢不勤

的腐儒毫无共同之处。驰骋商场，使他们具有开放思想和现代人的眼光。在这批成功的人士身上，我看到商人与文人并非是绝缘的。这些人士经商之所以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们信奉儒学精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做生意也要讲究德行，德行在商场上表现为重信誉，守信用，以诚待人。用欺瞒手段和劣性商品坑人，是不能持久，最终要垮台的。

在欧美高等学府执教的学者、书斋型作家显得优哉游哉，他们大都有丰厚的收入和安逸的生活条件，从事写作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儒商”作家便没有那么好的福气了，他们大都不得不在繁忙的商务之余，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秉烛伏案爬格子。由于缺乏系统的学校教育，他们知识结构大都不甚完备，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严酷的生活磨炼出来的探索精神，是他们的创作资本。“儒商”作家为文无须谋稻粱，这是他们拥有的一大优势，他们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出于弘扬中华文化而拚搏的自觉奉献精神去从事创作的。相比之下，一些学者型作家还不见得有这么洒脱，他们有时从事写作，是为谋职晋升高一级职称创造条件；再说，他们也不会拿钱去办文学事业。

儒商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一支奇葩。儒商作家大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经历过商场、文场、情场的磨炼，作品表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不薄今人爱古人，在艺术风格上则因人而异，或风流倜傥或细致严谨，或缠绵悱恻，不拘一格。儒商作家在创作经历方面也有所不同，有的在儒商前有过笔耕记录，后一度弃文从商，待经商发达之后又重作冯妇；有的经商、写作两不误，始终未放下手中之笔；有的先

前并无创作记录，在商界崛起后，有钱又有闲了，便附庸风雅，开始了笔耕生涯。有人对儒商的“附庸风雅”颇有微词，我则对此大为赞赏。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对？！从小处讲，有助于个人的陶冶性情，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从大处讲，有益于繁荣华文文学创作，有益于弘扬中华文化，实在是好得很！

东南亚华文文学走过了几起几落、载浮载沉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为什么到了80年代中出现空前繁荣景象，笔者认为，之所以能在华教滑坡、华文式微的困境中迎来黄金季节，这与儒商作家群的崛起是分不开的。儒商文学的汗马之功不可抹杀，且应发扬光大之。展望东南亚华文文坛，儒商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儒商文学已呈勃兴之势，真是可喜可贺！

目 录

儒商论

三军并起光我中华

漫谈“儒商文学”

为亦文亦商者正名

以文扬着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儒商文学

——读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所想到的
经济与文学的有机结合

文学与科技联姻

漫谈“旅游文学”

“香港游”缘起趣闻

从“梁凤仪现象”说开去

儒商文学之歌

——写在首届世界儒商文学研讨会之前

儒商文学异军突起（存目一）

儒商文学独具风采（存目二）

儒商文学香飘云外（存目三）

儒商文学独领风骚（存目四）

双才作家群像（存目五）

儒商现象透视（存目六）

文商角色反串

儒商不好

——儒商文研会会前花絮之一

“出书热”是可喜现象

——儒商文研会会前花絮之二

最识时务 精英一族

——儒商文研会会前花絮之三

诗坛奇人黎青（见拙著《香港作家剪影》）

黑暗尽来是光明——记张君默（同上）

艺术型气质的施叔青（同上）

烙印——记华莎（同上）

“沙爹诗人”原甸（同上）

文坛婆媳花——黄文宗与张永珍

（见拙著《世界华文女作家素描》）

陈若曦的艺术世界（同上）

黄昏美人黄宗英（同上）

实业家徐爱珍和散文家梦莉（同上）

马华文坛第一位使者戴小华（同上）

胆识才能兼具的小蓉子（同上）

马华翘楚云里风

致富有大道

驰骋泰华商场的一条蛟龙

聚散魂梦总相依

菲华文坛的桥梁——记新潮文艺社

儒商风采——喜读《林健民文集》

学者风范邵健寅

为了繁荣华文文学——记骆明先生二三事

高举中华文化大旗的周颖南

重阳时节访流军

关于“为之序”之我见

美辣丰盈短小精悍

犀利灵巧的讽刺小说

儒商文学一枝花

向出版家致敬

诗的乐章 学者的启示

——读查良镛先生的《北国初春有所思》

美而真——读路羽的诗和文

走以商养文之路 加华作协主席卢因印象

海外华文学巨观扫索

后记

首届儒商文研会部分论文目录

论文一 林健民：现代儒商的任务

论文二 周颖南：儒商的光荣任务

论文三：潘亚墩：儒商论

论文四：周南京：儒商论

论文五：张世君：浅谈西方儒商文学传统

论文六：费 勇：关于儒商文学及其评论

论文七：王列耀：意识的多层与在当代的必然

儒商论

潘 亚 暎

人的一生是否只能做一样事情，从事于一项职业？当然不是。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能人身兼数职，在各种领域都有所建树。就以中国古代文学家为例：司马相如当过常侍，王粲当过相掾，谢灵运当过太守，李白当过翰林学士，王安石更是官至宰相。以文章求取个人前程，这是几千年封建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的唯一进身之道，也是隋唐以下历代帝王限制和收买知识分子的阴险手段。此外，像儒将、儒医也屡见不鲜，素受推崇。然而，若将儒与商挂起钩来，便不受推崇了，非但不受推崇，而且将受人攻讦，究其根源，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

轻商观念源远流长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外族侵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封建统治者历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封建帝王把商品生产视如洪水猛兽。因为，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促使封建经济的瓦解，打破地区的割据。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小农经济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的特征，使近代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轻商倾向，便是由此而来的。

儒，乃春秋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既深且巨。“士农工商”，商居四民之末。儒家的轻商心态是根深蒂固的。宋代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致书呆子们都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在诸般“下品”之中，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社会地位十分卑下，在文下笔下的商人形象都是很丑陋的。太史公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替商人说过几句公道话，他写道：孔子的门徒子贡，曾是一位“废著鬻财”的“儒商”，后来经营成功，“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是风光。后世文人对史记中的这段记载耿耿于怀，咒骂这是“退外士而进奸雄”之举。历代皇朝的政令都有压抑商人的记录，诸如：不准商人衣丝乘马，绝其仕途，课以重税，等等。这些都使得商人心灰意冷，一般在累积了一定财产之后，便购房置业，洗手不干了。

儒家向来倡导清贫自守，标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将“君子求义不谋利”视为文人之典范人格。儒家的鄙商传统，简直是无以复加，似乎一谈到利，一言商，就沾染了俗气、铜臭，就不那么清高了。不仅文人鄙视商人，连商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比如，《儒林外史》里的周进，科场屡试不第，只好退而从商，他在贡院号啕痛哭，同行的商人问他何以沦落从商，为他（也为他们自己）“受屈到此田地”而叹息。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直唱了千年，唱得商人个个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讽刺商人品行低下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一则故事说，历史上有位名叫王绂的画家，深夜独行，闻悠扬的箫声而陶醉。为了感谢吹箫人，欣然作画相赠。不料吹箫的是个商人，得到王绂的这幅竹墨画后还不

满足，打发家人买了条红鲢鱼片送给王绂，要他再画一张。王绂得知原委，一气之下把画撕了，把鲢鱼片扔了出去，表明士大夫对商人的格格不入。

星移斗转，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儒家那种根深蒂固的轻商意识，终于划上了停止符号。现代社会须臾离不开商，经商行为涵盖了人类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它包括了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中国人终于认识到，我们民族几千年一贯制的轻商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几千年形成的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扭转过来的。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文学的品性，大体上仍是继承和发扬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使之与仕、与政紧密相联。随着社会的急速转型，文学日渐失去昔日的风光，社会出现了多元价值并存的情形，有些文人不愿安贫乐道，“下海”经商，而有些商人则附庸风雅，舞文弄墨，于是社会上就有了“儒商”这一新名词。儒商的出现，是社会上一批文人和商人对人生价值重新选择的结果。这也是观念大变革的结果：一批批文人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搏风击浪；一批批商人则对文学的神秘殿堂产生了兴趣，试图（或已经）登堂入室，领略其中的奥秘。他们中的很多人走的是亦儒亦商之途，在文与商两个领域进进出出，脚踏两只船，游刃有余。

对于儒商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视之为非文非商的怪胎，横竖看不顺眼，在他们心目中，文人应该是一幅形消骨立、慷慨悲歌的形象，现在忽然变得西装革履、红光满面，总觉得难以接受。

儒商拥有的优势

有人坚持说：儒，是清高的；商，是庸俗的，二者冰炭不相容。

文艺创作和商业行为，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业，其间的价值差异是很大的。比如，商人精于算计运筹，主要是运用逻辑思维；文艺创作要有丰富的感情，主要靠形象思维。商场如战场，充满惊心动魄、勾心斗角的竞争搏斗；文人则需要耐得寂寞，苦苦求索。香港儒商诗人吴正在《一篇流产的发言稿》中有一句精辟的话：“不能将写诗当作生意来做——这样产生的诗绝对是腐败的；而做生意的种种却能当作诗来写——这是因为做生意本身也是一种生活，一种人生，一种充满了哲理思索的去伪存真，这些都是诗的素材。”换句话说，儒与商二者是有区别的，但二者又有暗通之处，文人与商人走在通向不同世界的立体交叉桥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贵贱有序观念根深蒂固，不仅严重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妨碍了文艺的发展。因为，文艺创作需要有自由的心灵和对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的摒弃。在这方面，市场经济给文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譬如，在商品价格面前，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任何人都享受不到什么特权。商场上的行情、信息，给人们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商品的自由流通，必将促进知识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由此而培养了人的挣脱束缚的自由意识。这种意识能帮助作家、艺术家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也是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条件。

有人强调：文艺不应当是功利的，而商业行为则是彻头彻尾功利的，因而他们反对儒与商结缘。

诚然，文艺是人类心灵与精神所需要的东西。任何一种想利用它、使它变成一种实用主义价值的念头，都是与文艺的本质相悖离的。然而，在今天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在文艺创作中，那些驰骋商场的商人，在兴之所至埋头书斋时，能撇开功利，执着地追求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无须为稻粱谋，他们需要的只是如何提高艺术素养。反观那些文人，自商品经济放开物价之后，由于工资低，家累重，颇有困顿之感。许多“应对文学”、“快餐文学”之类艺术上粗制滥造的文学的大锅饭，就是出自文人之手。

“文穷而后工”这句话，在当今是行不通的。（著名美华作家陈若曦多年前曾告诉我说：“情愿不工也不要穷”，跨入90年代，她亦文亦商大有收获。）因为一穷，难免为生计而发愁，在柴米油盐的困扰之下，要操笔杆写作，是很难静下心来。鲁迅在《“碰壁”之后》一文中对此早有精采的议论，他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鲁迅的《隐士》进一步指出：“虽是渊明先生，也还各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鲁迅联系自身，还历举古代文人的例

子，要证明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贫穷是作家创作的大敌。

文人爬格子若是为了煮字疗饥，必然是要去考究哪家报刊稿酬高、关系好，这就很难产生佳作了。“我不要穷”，这是李嘉诚的一句名言。我就不穷，所以才能为许许多多没有稿酬的报刊杂志写诗做文，并能呼朋唤友聚餐言欢，心情舒畅，文思如涌，有写不完的话题，不然，怎能如此丰收、快乐呢？

商业上的成功，使一些儒商得到一个安定的、不被人左右的创作环境，它成为他们拥有的创作优势，进而利用这种优势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利用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先进设备来提高他们的高效率，达到高效益，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在一个不需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经济环境中，儒商们就可以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能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作品，也敢于言人所不敢言、写人所不敢写的佳构。

“文学是人学”，这话固然不错。然而，无论你多清高，都得承认人又是经济动物。既然是人，又怎能离得开衣食住行？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创作，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儒与商的异与同

儒与商，文坛与商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二者常能统一在诸多的共性点之中。

从广义上说，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文与商，就好比一个是建筑物的地面部分，一个是地下基础部分，二者无法分劈。

文人轻商，可以说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其中有显而易见的偏见与傲慢在作祟。事实上，经商与投机诈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说“无商不奸”，是一篙子打了一船人。就如同说“文人无行”，否定了所有文人一样，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儒家最强调的，就是性善与伦理，乍看与商场的争斗水火不相容，其产不然。经商务决非行骗术，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做生意也要讲究德行，要守信用，以诚待人，童叟无欺（泰华富商、暨大校董颜开臣曾对我说，他是做到一分钱一分货的，所以订单多到做不完）。探究一个成功的商人的经验，往往有一条共性的东西，即信奉儒学讲信义的精髓。一个成功的商人，往往有很高的气质，眼光和气魄，有高尚的人格。一个有高尚人格的人，其人格在从商时转化为商格，在从文时转化为文格，没有人格的文人去从商时，必然成为奸商。

在不少人的意识中，商人成天忙忙碌碌，为利而熙来攘往的，不是忙于洽谈业务，就是忙于交际应酬，哪有兴趣欣赏文艺作品，更遑论著书立说了。其实，世间的事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笔者结识的不少成功的商人，就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他非一头钻进钱眼里浑身散发着铜臭的凡夫俗子。他们不仅在商场上精明强干，富有经济头脑，而且热爱生活，兴趣广泛，艺术品味高雅，喜爱文学作品，商余跃跃欲试，自己动笔爬格子，叩开了文学殿堂之门，登堂入室了。对于这些能人，商与文就如同熊掌与鱼，并非不可兼得。尽管商务，是以利为准则；文艺，以情为准则，而那些亦文亦商的“双才”能人，却能将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和谐地统一起来。

他们像是一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白天，他们陷入繁忙与焦虑重重的商务活动，夜深人静时，他们在静谧的书斋里，自由地遨游于艺术的天空。

儒商，决非文化掮客，决非唯利是图的伪君子。一位儒商对笔者说：我白天做生意时，在商场上跃马横枪，赴汤蹈火，此时，感情的闸门是紧闭的；晚上在书房里打开书卷，摊开稿纸，此时人的感情却从开启的闸门里一泻而出，像大海的波涛，奔腾激荡。著名华侨爱国诗人翠青则说，做生意很痛苦，写诗最快乐，我情愿写诗，不愿做生意。如今他上岸了，遨游世界，做个世界诗人非常惬意。小说家流军亦有同样的体会，情愿只写小说而不做生意。如果不用在商场上拼搏，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将会更辉煌。然而，他如果不经商，又怎能写出36万字的长篇小说《浊流》呢？可见文商结合自有其优势和不足，世界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呢？事实是，不论是翠青还是流军经过一番拼搏终于成功了。

商人、文人角色反串种种

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经济活动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文艺自然也要反映它。当然，不是局限于记录经济活动本身，描写的中心是人。

商界是具体而实际的，写商界题材的文艺作品与从事商业活动一样，坐而论道不行，搞花架子也不行。一个人如果缺乏经营工厂、银行、金融、商品经销方面知识，他就无力驾驭“商”这一大题材。如果一个商人同时又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素养，他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就会显得游刃有余。

儒商做的生意自然有大小之分，他们所获得商业利润也

各有不同。他们所品尝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成为他们创作的资本。

“下海”的儒商，暂时不写东西，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商界对于文人而言，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当他们刚刚迈入这一领域时，当务之急是熟悉它，商界的白热化的竞争，也迫使他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就像一个不谙水性的人投身于大海，必须尽快学会游泳，至于大海的风云变幻和游泳时的种种感受，待学会了游泳，能在碧波中自由穿梭时再写也不迟。只要心存对文艺的钟爱，收获是早晚的事。

很多“上山”（有人把商人从文比作攀登创作之山）的商人，过去并无创作经历不过大都喜爱阅读，有一定文学根抵。待到事业发达之后，有钱又有闲了，便跃跃欲试，握起笔来去叩文艺殿堂之门。这非但不应嘲讽，还应鼓励、奖掖。有人称之“附庸风雅”，在笔者听来这个词不含什么贬意。附庸风雅有何不好？！有了钱难道只能去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而不允许有高雅的艺术追求吗？艺术的殿堂是圣洁的，但它应该向每一个虔诚的志者敞开。事实上，有一些儒商在经商前虽并无创作经历，但由于他们原先打下了较扎实的文艺功底，加之心诚有毅力，在经商过程中连带体验了生活，积累了创作素材，有的出手不凡，很快写出了力作，此乃“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也。更多的商人走的是亦商亦文之路，一手打算盘，一手握笔杆。因商务繁忙，缺少整块时间，所以，短诗、随笔、小品、小小说便成为他们喜爱的写作体裁，便于在商余见缝插针地完成。

总而言之，文人“下海”与商人“上山”，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反弹，是文人和商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重新体认和